

《星期评论》对科学的认知与推崇

杨宏雨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星期评论》是五四精神的产物,在反科学思潮日渐滋长的背景下,该刊喊出了“科学万能”“科学万岁”的口号,不仅从理性救国、社会改造、破除迷信、思想启蒙等方面探讨了科学的意义,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把“研究与批判”确定为科学的精神,是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拥护者和助推者。在对中国社会改造之路的探索中,《星期评论》把以科学为基础的机器工业看作是现代文明的条件和关键,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造既要发展“科学的机械工业”,又要构建一个合乎科学、人道要求的分工协作的互助社会,这一思路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

[关键词]《星期评论》;科学万能;科学精神;机械工业;互助社会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8.015

一、科学万能、科学万岁

《星期评论》是五四精神的产物,是《新青年》领导的新文化阵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星期评论》高度推崇科学在社会变革中的价值。在该刊的创刊号上,戴季陶直言“科学万能”,并三呼“科学万岁!”^[1]这意味着科学在近代中国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星期评论》从多个方面探讨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一)科学与启蒙

“启蒙”一词来源于法语 *lumières*,意思是光明。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启蒙的目标包含自主、理性、进步、解放等多方面的内容。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大主张:“自主的而非

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3]代表了五四时代中国启蒙运动的要求。

在《星期评论》上,沈玄庐等人高度肯定了科学在解放、进步中的作用和意义。沈玄庐指出:科学知识是“应用的工具”、解放的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工具之先,便不必妄想良好的工作。凡是应付政治法律等等,都应该有圆满的知识。——不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结果徒有解放的空言罢了。”^[4]廖仲恺也非常强调科学知识在解放中的意义:“无论要造那一个解放,总要靠自己自觉、自己要求、自己奋斗。从道德上、知识上、体育上准备过自己解放的手段,一面自己去解放,一面自己去准备,这解放才有点光

明。”^[5]沈仲九指出,智识与理想、进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智识愈发达,理想欲也愈发达;理想欲愈发达,进步也愈急激”。^[6]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京、上海等众多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罢市、罢工运动。五四运动是自戊戌变法以来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个硕果,同时又推动了中国的进一步启蒙。戴季陶在五四运动中发现一个现象:在这次风潮中“各省府县学生比各界都强”;“北京大学学生的‘决心’、‘觉悟’,比旁的学校学生强”。^[7]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他认为这与学生接受科学洗礼以及接受科学的程度有关。“科学万能”和“科学万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喊出的。1913年戴季陶在《爱之真理》中曾明确表示,不赞成“科学万能”,^[8]6年以后却在五四运动中高呼“科学万能”“科学万岁”,这显然是因为他从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中认识到了科学巨大的启蒙作用,因此戴季陶用“科学万岁”来礼赞启蒙精神。在这里,科学万岁就是科学的启蒙精神万岁。戴季陶高度肯定文化启蒙的意义,他把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一场伟大革命:“你以为一定要炸弹、手枪,军队,才能够革命,才算是革命,那就错了。平和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大创造的先驱运动!”^[9]I. C. 从五四运动联想到中国的变革,他认为五四运动这场中国的“国民自决运动”是“从大学里发生出来的”,是科学和文化运动的产物,“如果中国再多有几十个大学,多有几百个有思想有学问的大学教授,多有几万个大学学生,中国的新文明,岂不是不到几年便发扬光大到了不得吗?”^[10]

(二)科学与理性救国

甲午战败后,中国完全沦为受西方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康有为用“瓜分豆剖、渐露机芽”^[11]形象地概括甲午战败后中国的危局;梁启超更直言:“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12]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局面,随着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和军阀混

战局面的出现,随着《二十一条》等有损中国主权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图存仍是中国社会的关注重点。

《星期评论》把科学看作近代文明的根本特征,强调救国要依靠科学与理性。戴季陶说:“今日之世界,科学竞争之世界也,无论政治、法律、军学、工商,其发展进步,未有不赖乎科学者。”^[13]在科学和文明发达的时代,爱国、救国不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靠冲动和蛮力,而要靠理性和智慧,“一定要有科学智识,方才晓得爱国;由科学智识发生出的爱国心,方才有真价值。”^[14]戴季陶这里用了“智识”,而不是“知识”,智识与知识虽然有时可以通用,但智识有智慧和见识之意,包含了理性的态度、恰当的方式和周密的方针等。蒋玉也说:“人民文化程度的高低,关乎国家的兴亡。”^[15]在竞争世界中,知识和学问是“最重要的”,如果学问知识不能与人对抗,那就“逃不过优胜劣败的天然淘汰的公理”,就要屈居他人之下,受人奴役和压迫。^[16]

在探讨救国方式时,《星期评论》把科学与理性结合在一起,强调科学救国和理性救国的一致性。与当时一般激进人士强烈主张学生起来干预政治、推进社会变革不同,张继提出了一个类似于蔡元培“救国不忘读书”的主张。他虽然肯定学生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迸发出来的“爱国热心”和救国举动是“合理的”“正当的”,肯定五四运动中“全国的学界联合起来”,用罢课、游行等方式来唤起国人,是救国的“一个极大的力量”“一个极大的武器”,但他坚持认为,科学为救国之本,学问为救国之要,“顶真切的爱国是甚么?就是求学,就是努力研究科学。”“无学的国,无学的人,拿什么来做人?拿什么来爱人?拿什么来做‘文明战’的武器?拿什么来做国家的基础?”所以,他不希望学生经常因罢课、游行等救国行动而荒废学业,他希望学生们把救国事业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和厚实的学问上。^[17]

(三)科学与社会改造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这是中国人在制度

上学习西方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中国从专制比较平稳地走向共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希望。但好景不长,先是有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接着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民国仅剩下一块空招牌。《星期评论》的同人们认为,民国建立起来以后之所以有名无实,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知识没有普及,国家的观念没有真确,德谟克拉西的真意不曾了解”。^[18]中国的官僚“蠢如鹿豕”,中国的绝大多数学者守旧、“顽固”,迷信“国粹”,“智识和思想”都十分“幼稚”;与此同时,一般的人民“迷信神鬼,迷信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哲学医学”,毫无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知识。^[19]凡此种种,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和混乱。

戴季陶等人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水平高,科学思想发达,整个国家的理性程度就高,社会改造之路就比较畅顺、稳健,反之则容易陷入混乱、动荡的局面。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各国传播。戴季陶比较日本和中国对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日本的‘科学思想’比中国发达得多,人民的程度也高得多”,布尔色维克主义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对于“布尔色维克”的问题,竭力“去根究他的真相”,“研究从道理上去对待他的方法”,“绝不像中国人这样糊涂,怕起来便当作神鬼一样,连名头也不敢提起。看见有讲两句新话、作两篇新文字的人,便指鹿为马的说这是过激党、那是过激党。”^[20]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知识程度太低”,“一般的人对于世界上思想的系统不能够明白”的状况忧心忡忡,担心“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结果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21]

知识就是智慧和远见。戴季陶认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有智识有学问的人来引导,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研究社会问题,从“思想上知识上”领导社会大众,那么,社会改造运动就

可能“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那样,中国的前途“实在是很危险的”。^[22]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应该走甚么路”,这需要有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的学者站出来做“黑暗中的明灯”,通过“研究、调查、讨论”,然后“把真确的意义、正当的方法来指导社会,使中国的多数人大家明白了解”。^[23]

(四) 科学与被压迫阶级的解放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就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统治者、压迫者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占优势,欺压被统治者、被压迫者,除了他们拥有财富、掌握国家机器外,也与他们占有知识、垄断文化有关。李汉俊在《强盗阶级的成立》一文中说:智识是资本家阶级掠夺、剥削贫民的“武器”,资本家就是“以国家、法律、道德为堡垒,以智识为武器,以金钱为弹丸,在青天白日之下、万目环视之中,掠夺平民财产、剥削平民血汗”的强盗。^[24]

智识是统治者和资本家阶级控制平民、榨取劳动阶级血汗的武器,所以他们拼命地想垄断智识这一武器。戴季陶说,那些官僚武人和迷信国粹的学究,“最希望的是全国人都不识字、不读书”,希望读书识字的人“都不研究科学,不与现代文明接触”,这样他们可以永保自己的统治地位。作为被压迫者的劳动者阶级如果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识字、读书、接受科学和现代文明,让自己“从‘被治者’的地位觉醒起来”。^[25]

戴季陶等人对当时中国劳动者缺少文化知识的状况深感忧虑:中国的工人“几乎百分之九十九认不得自己的名,写不出〈自〉己的姓”,^[26]“他们阶级的自觉是一点也没有的”。^[27]由于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缺乏阶级自觉,中国的工人对组织工会、筹措罢工基金、同盟罢工等在欧美国家劳工运动中很普通、常见的事情知之甚少,常常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罢工,“罢工的行为,不能整齐严肃”,“一旦继续到两三天,罢工者已经困难到了不得”,“各工厂的罢工,都是单独的行

动”，得不到他厂工人“同情的协助”，结果罢工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劳动者‘知识’、‘训练’、‘团结’都不充分”，中国劳工运动始终处在起步阶段，“目的都是为了改良待遇条件”。^[28]

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认识到以教育激发劳工阶级意识，实现阶级解放的意义。戴季陶说：“现在我们从事于劳动运动，是用我们的智识和热心去指导他们诱掖他们，但是，他们如果不到自己发出自动力的时候，劳动运动的意义是生不出来的。空口说话，单想靠几个智识阶级的人用意志和感情去激发劳动阶级的人，利用他们的受动性，以为这样便可自然生出一个协作共享的社会来，这种空想是不中用的。”^[29]李汉俊也说：“靠‘脑力的劳动’生活的人，应该大家觉悟到我们的地位和永久的利害，是与‘体力的劳动者’一样的。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智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智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30]智识阶级或脑力劳动者所要承担的责任，并非单纯指导劳工阶层，而是要以智识激发他们的主体性，开发他们的“自动力”，这是劳工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文化运动的真正意义。戴季陶说：“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使一个经济体里面大多数不得享受文化利益的人享受文化的利益。”他希望中国从事文化运动的人，“认清楚‘文化’的意义……切切实实的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尽力。”^[31]沈仲九说：“文化运动，就是要把科学、艺术等东西，普及到一般平民，去改进他们精神”。^[32]文化运动并非智识阶级自己的觉悟和自嗨，而是一场打破阶层壁垒的社会运动，其真谛就在于使更广大的社会群体获得科学知识、利用科学知识、享受科学知识，建设理想的“协作共享的社会”。

（五）科学与破除宗教迷信

科学是宗教、迷信的对立物。《星期评论》提倡科学，自然要反对迷信和宗教。

《星期评论》揭示了宗教、迷信产生的原因。李汉俊说，迷信产生是因为在古代，人们“受自然力的支配很大”，“对于有破坏能力的暴风迅雷……不能够防范抵抗，便十分畏惧他，崇拜他”；对于“那较毒而又无声无色的长蛇，防范很不容易，而且蛇的形像，也很奇怪很灵妙的。”于是“他们看见这种可畏而又奇妙的动物，就发生了崇拜灵物的观念。”^[33]戴季陶说，人们对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物”产生“一种恐怖”，“由这一种恐怖就引出他们神秘的意识来，于是乎迷神信鬼。”^[34]

《星期评论》揭露了统治者提倡宗教迷信的险恶用心。刘大白认为，纲常名教是“思想的监狱”，统治者提倡纲常名教，就是要“教你死心塌地的屈服”，“绝不容你有思想自由的幸福”。^[35]蒋作宾指出，“宗教本是一种哲学伦理学，立意都是非常的慈善，并没有叫人仇杀排挤的意思”，但是后来“被那野心家（如帝王及治者阶级等）及狡猾的人，藉词利用，并添其种种妄诞的神话鬼语，钳制人民的思想，闭塞人民的言论，束缚人民的行动，愚弄欺侮，无所不至”。他还解释了资本家愿意出巨资兴建教堂的用心：“一般资本家，恐怕那农奴工人，不就范围，心内想唯有那宗教是最好牢笼人的器具，所以拿出巨款，广设教堂，使他们都入这个俯首帖耳的圈套。”^[36]

《星期评论》揭示了科学在反对宗教迷信中的巨大作用。蒋作宾说：“近代科学发明，揭破宗教的假面具不少……现在稍有知识的人，也就渐渐的不为所愚了。欧洲方面，对于宗教的观念，可谓淡薄到了极点。”^[37]《星期评论》上刊登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指出：“‘神’‘鬼’，这种迷信，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害死了几百万万人。自从科学思想输入进来，迷信的观念，从中国新智识阶级里面，渐渐的脱离了。这是中国人在‘人’的意义上面的最大觉悟。”^[38]沈仲九指出，中国过去的社会是“神秘的社会”，是“迷信神权，完全受自然支配的社会”，中国的将来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科学应用”很发达的“科学的社会”。^[39]

《星期评论》信奉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态度是坚定的,只要是宗教迷信,一不看提倡的内容是否对自己有利,二不看提倡者是否是新阵营的朋友,一律反对。1919年10月,著名革命党人徐谦在《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发表《宗教的共和观》,认为中国共和制度屡遭挫折的原因既不是人民文化知识程度低下,也不是共和不适合国情。他从基督教教义中附会出“共和是上帝赐予人民的,世界潮流,一定要趋于共和的”等说法,希望人们“速发信仰上帝之心”,早日建成真共和。^[40]在刊发这篇文章的时候,《星期评论》就用按语表明,登载此文是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是供读者“自由批判”的。接着,戴季陶在第19号发表《宗教与信仰》,从历史和事实两个方面论述说:“共和政制不是由基督教来的”,“多数国民信了基督教并不能得到共和”。^[41]1920年2月,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称颂基督教是“爱的宗教”“穷人底福音”,“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爱与信”,并主张中国人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42]沈玄庐发文批驳说:信与爱都是人类的,“人类自我的信与爱,不是天父所给他的信与爱,更不是为了天父才信与爱”。我们中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跳出“冷酷、黑暗、污浊的深坑”,“不必借耶稣的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文末,沈玄庐还说:“我们相信人要自己做的,不是依靠宗教来做人的”;“我们很不愿徐季龙先生拿宗教作救国运动,我们更不愿独秀先生拿宗教作文化运动!”^[43]

科学万能论是19世纪人类进入科学时代的产物。科学万能论包含了人类进入科学时代的自信与乐观,但其背后也夹杂着傲慢与偏见。科学万能论是人类“主体性极度膨胀”的体现,“其结果是主体本身异化为客体,人成为可以被随意操纵的对象,与自由解放的追求背道而驰。”^[44]

19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科学万能论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科学的指摘更多,当时欧洲人对科学的态度,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45]当欧洲人已经意识到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理性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功用是有限的,科学无法解决许多需要人文关怀的主题,这时戴季陶等人仍在《星期评论》上鼓吹“科学万能”,三呼“科学万岁”,是否不合时宜?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中西方“巨大的时代落差和不同的文化土壤”。^[46]20世纪初年,科学在西方已经被崇拜得过度,而在中国却是还没有完全扎根,用胡适的话说是:“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47]据日本学者小林善文研究,“五四”时期中国平均识字率仅为10%~20%,^[48]这个数字远低于同一时期的欧美和日本。

其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中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否定欧美文化的声音。如在中国首倡民主和科学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在晚年居然说:“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由来爱国说男儿,权利纷争总祸基。”^[49]“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严复径直否定了欧洲文明,否定了自己早年倡导的科学和权利思想。与此同时,他竭力吹捧被自己早年否定过的孔孟之道,称颂其“量同天地,泽被寰区”。^[50]1916—1917年,曾以提倡科学著称的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文,指陈西方文明的缺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况。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声言西方人曾“讴歌科学万能”,“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结果现在“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因此无限凄惶失望”。梁启超虽自言自己不敢“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51]但他的一通发

言,却助长了反科学、反启蒙的势力,胡适直言:“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52]梁漱溟认为,虽然人类目前正在走西方化之路,但“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53]上述这些否定和反对西方文化的言论,在当时搅乱了不少少年人的思维,阻碍了自戊戌维新以来不断壮大的科学启蒙思潮。

显然,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星期评论》所提出的“科学万能”“科学万岁”的口号虽然有失偏颇,但其积极肯定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启蒙价值,积极肯定科学在启蒙、救国、社会改造、反对宗教迷信等方面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是合乎当时中国社会对科学及其理性精神的需求的。

二、科学的精神:研究与批判

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把科学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科学精神,一是科学方法,一是科学本身,一是科学的应用。”^[54]在以上四个方面,时人最重视科学精神。任鸿隽把科学的精神看作是科学的“源泉”和根本,强调说:“舍此而言科学,是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冀泉之流,不可得之数也。”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于学术思想上求科学而遗其精神,犹非能知科学之本者也。”^[55]他还把科学知识比作花,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比作“种子”和“种植之法”,指出“外国有好花,为吾国所未有,吾人欲享用此花,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必得其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而后可”。^[56]陈嘉异说:“西方文化之特长,实有最要者三点:(1)科学之方法与其精神;(2)物质文明;(3)社会组织力。此三者,又实以科学精神一物贯之。”他认为我国先民“最缺乏此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实吾民族所应虚心完全采纳者”。^[57]屠孝实认为科学精神比“科学家所发现的公理、法则,与其根据公理法则而创造

出来的东西,如轮船火车电报之类”更有价值,并说科学精神“有永久的价值”。^[58]郭沫若说:“从希腊文明递演出的科学精神亦正是我辈青年所当深深吮吸而以之为营养的一种资料。”^[59]就连梁漱溟也承认西方学术思想“特别的彩色”就在于“科学精神”。^[60]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弘扬主要是对科学精神的倡导。1937年,何干之指出,陈独秀等人所拥护的科学和民主,“德先生是一个政体,一个政治思想,赛先生是一种方法,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61]1940年,陈铨说:“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第一是德谟克拉西,第二是科学精神。”^[62]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求或企图把西方的近代科学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来改造中国人,来注入到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中”。^[63]目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侧重于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和呼唤,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

五四时期,对科学精神的认知主要有:偏向目的的“追求真理”说——“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胡适)偏向于态度的“实事求是”说——“科学精神,便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瞿菊农)《星期评论》另辟蹊径,从方法论入手,提出了“研究与批判”说:

在理知的进化上,最要紧的事,就是研究和批判。自由精神的发扬,和真理的发现,两者都从研究和批判上来的。……研究和批判,就是近代文明的真意义,就是科学精神的表现。^[64]

五四时期,戴季陶等人已经认识到一切科学知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科学是绝对的,是“非常确切的,是有证明的,是不可移的”,^[65]因而是真理。“科学之理,绝不可易之理也。若学者有误,则其误也,即非科学,即为迷信。”^[66]“科学之效用,可以垂之久远,可以普适于现所知之世界。”^[67]同时,科学又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在:(1)一切科学都是一种假说,其真理

性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科学在“不断的进步”^[68]，“昨日所是者,今日不免以为非,无所谓永远。”^[69]另一方面,科学上的许多“规约”(定律),有一定的前提和适用范围,离开这些前提和适用范围,“于彼是者,于此为非,无所谓绝对。”^[70](2)科学包含社会科学,这更增加了科学的相对性。李汉俊指出:“社会科学是要随生产技术底进化而进化,又因为一时代为一时代的生产技术,所以社会科学底内容也有一时代一时代的不同。又因为同时代同国内有各阶级的利害底不同,所以同国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底内容也有阶级与阶级之不同。”^[71]

这种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决定了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一个随时准备修正自身错误的过程。因此,科学“随时容人议论”。允许和欢迎一切有道理的研究和批判,这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科学进步的要求。“打破科学上偶像者,惟以科学之研究可以得之,此外皆不能成功。”^[72]离开了研究和批判,极容易“把假真理认成真正的真理”,“去死抱定,不再推论……我们的科学就不能发达了。”^[73]

研究与批判有助于增强理性,消除认识上的各种障碍,发现客观真理。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现真理、认识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但是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智慧的双眼极容易受到各种蒙蔽。这种“蔽”主要有:(1)盲从权威。《星期评论》多次提出了要打破权威,才能发现真理。林云陔在《唯物史观的解释》一文中指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少人盲目相信“为生存而竞争这一个进化公例”,导致互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被遮蔽。^[74]在《星期评论》第7号刊载的由季陶翻译的《社会主义与两性关系》一文中也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以后,不少人对其理论的认识过于片面。事实上,“只有从周密的科学研究上,方才可以决定马尔萨斯主义所提议,何者为社会的?何者为非社会的?何者在健康上无害?何者有害?”^[75](2)迷信古人。与西方人迷信权威不同,中国人最喜欢

迷信古人,一切都是古代最好,一切都是古已有之。沈玄庐指出,做学问要研究真问题,要有开放的意识,“求学问的不必在故纸堆里,找些和新思想隐约相似的零碎话。”^[76]那种古已有之的溯源式的做学问的方式,一是不能推进学术发展,二是极有可能演绎出西学中源的虚骄,阻碍中国的开放与进步。(3)自我崇拜。对自我的迷信体现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没有受批判的雅量”,一种是缺少自我批判的勇气,“我们中国的著作家批判家,只管主张种种的说头,只管指摘他人的短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写出赤裸裸的告白来的勇气……没有人敢把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明明白白地披露出来。”^[77](4)利益关系。戴季陶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可以把自己的利害完全抛开,纯粹致力于真理的发现”,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意识,往往受他自己境过(遇)的束缚”,“往往不能抛开自己利害去求真理。”^[78]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还讨论了如何进行科学的研究与批判的问题。

研究一词由“研”与“究”两字构成。“研”指审查、细磨;“究”是指穷尽、追根求底。研、究两字合起来就是仔细寻找、反复探究的意思。戴季陶、沈玄庐认为,研究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作“切实研究”,那么就无从了解问题的“真象”,也就“无从研究防止的方法”。^[79]在社会发展中,越是危险的思想和问题,越是要研究,因为不研究、一味地怕或躲,并不能减少危险。^[80]沈仲九指出:有人害怕激进主义的传播,不敢研究,不让人研究,但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思想或主义,“研究的人愈多”,盲从假借的人“愈少”,“将来的结果愈好,我们所受的利益就愈大。”^[81]

戴季陶等人指出,研究问题,首先态度要端正。戴季陶认为,求学的最高境界是“为学问求学问”,这一类学者怀抱追求真理的宗旨,能以无

功利之心,得功利之用;次一等的是“为社会文化求学问”,这一类学者怀抱推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之心,是以功利之心,求功利之用;最末一等的是“为功名求学问”,这一类学者不仅很难求得真知,而且失了“道德上的人格”。^[82]李汉俊说,研究学问,就是追求真理,所以“第一要态度诚挚”,“不能有所顾忌”,不能因为“怕遭愤怒,怕遭唾骂,将事实隐藏不说出来”,倘若那样,就成了“研究学问的欺伪者、学问的反叛者”。^[83]戴季陶也说,学者应该“以求真理为目的”,在是非问题上不应该模棱两可。^[84]

研究不仅要有追求真理的态度,还要讲求方法。戴季陶指出,研究问题,首先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界定。例如,研究伦理问题,首先要对伦理的概念做出科学的界定,“第一要了解的,就是伦理是甚么东西?从前那些‘古圣王之治民也’‘先圣之制礼也’,那些浅薄的伦理起原说,现在是不通行的了。‘今夫天之生命也’,那一种模糊影响的进化说,在今天科学的研究上,不用说更是毫无地位了。”^[85]科学的研究,反对在概念上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如果不对相关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自然就容易造成此亦真理、彼亦真理的状况,结果学术探讨不仅不能达到“真理愈辩愈明”的效果,反而导致思想混乱。

除了概念的科学化以外,在进行研究时,还要特别注意细致和科学化的分类。戴季陶在《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上海的劳动条件如何?》中,把当时中国的劳动者分成“商品化的”“非商品化的”“商品化与非商品化之间的”“未到商品化程度的”四类,并说“以上这四种分类法,能不能成为科学的分类,我也不敢必。但是从今天全经济组织上来看,差不多总可以叫做相当的分类”。^[86]

研究社会问题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又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目标定位——“应该用甚么做理想?”,第二个是方法选择——怎样实现理想,“用甚么方法最好?”^[87]换言之,解决社会问题,不仅要设置理想,而且要找

到达到理想的方法。对此,《星期评论》提出了三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法:

(1)要注意“比较研究”。只有通过对比,才能找到真相,才能作出合理的选择。戴季陶引用郭象的话说:“欲明无是无非,莫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88]

(2)要注意一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注意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李汉俊指出:“凡研究一国的事,如果不切切实实的留心他们国里的社会状态,结果一定不免要陷于错误的。”^[89]戴季陶更明确地说:“研究社会问题,是要切切实实的在本国的社会状态上去研究,不好只是在外国的社会状态上去研究。比方劳动问题,工钱、时间及待遇三者,是先进国劳动问题的主要题目。但是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还是在失业者过多。所以现在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在无业者的生活要求上面。”^[90]

(3)要十分重视调查统计的材料。戴季陶指出,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充分地占有相关的统计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如果“没有调查统计的资料”,单单“用推论的方法去批评”,那么“就学问上说,实在是很危险的”。^[91]他很赞同考茨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完全是得力于统计学的发达”的说法,“如果没有这种好资料,恐怕就是马克斯、因格尔斯那样的天才也决不会发现出这种精确的学理。”^[92]

批判一词由“批”与“判”两字构成。“批”原意是指用笔在相关材料上做批示,引申为分析、评论。判是指裁决、判断。批判一词受长期的革命斗争话语的影响,今天大多数人熟知的含义,就是对错误的思想和言行的批驳、斗争,忘记了它的基本含义是分析、判断,用哲学上的术语说就是扬弃,就是辩证的否定。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徐苏中等人指出,批判有助于理性精神的养成,“在理知的进化上,最要紧的事,就是研究和批判”;^[93]批判有助于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只有从研究批评可以得来,盲从和武断,都

是阻碍文化进步的。”^[94]沈仲九把批判旧思想和建设新思想联系起来,主张“对于旧思想,当取批评的、破坏的态度;对于新思想,当取抉择的、建设的态度”;“我们要改造自我,改造社会,不可不先打破关于旧自我、旧社会的思想,造成新自我、新社会的思想。”^[95]

在如何批判的问题上,《星期评论》提出了“自由批判”这一概念。“自由批判”包括“批判的自由”和“批判力”两个方面,只有两者都具备,才是“自由批判的最高处”。^[96]所谓批判的自由,就是要“在政治上法律上”确立和保障“绝对的言论自由”。^[97]在《星期评论》同人看来,批判无禁区,一切的人、事、思想、制度……都可以作为讨论和批判的对象。所谓批判力,就是批判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缺乏理性和常识,没有足够的学养和知识储备,那么,其所谓的批判,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胡搅蛮缠,即使有“批判的自由”,也无法作出合理的批判,实现自由批判的目标。五四时期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学者不少,但像《星期评论》上戴季陶等人这样明确把“批判力”作为批判的要素的学者并不多。在主张“批判的自由”的同时,强调批判者“要涵养研究批判的能力和受研究受批判的雅量”,^[98]这显示了《星期评论》在热烈的五四大潮中理性和冷静的一面。

主张自由批判的人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研究和批判的最高目标,所以他的批判不能顾忌自己的利益,要“抛开自己利害去求真理”;也不能顾及被批评者的面子,说什么“虽然他说错了,可是他仍旧是好意”,从而“把科学上的问题和道德上的问题混为一谈”;更不能“因为要避去他人的攻击和误会,便把自己的真知确见隐蔽起来,或者用许多不相干的文学名词去粉饰,或者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说头来躲避”。^[99]

自由批判,不等于胡乱批判,更不等于人身攻击。自由批判是客观的批判,“对于社会、政治及文学上的各种问题,都是持研究的客观批评的态度。”^[100]自由批判是有的放矢,在批判之前先

要比较完整地了解对方的观点、意见、思想主张,“不能够笼统统统的批评”。^[101]自由批判是学理的探讨,不管是学术批评还是文化批判,都不是针对人、批判人,而是针对被批评者“所研究的问题”中的观点、立场和方法。^[102]

自由批判是一种平等的批判。在创刊号上,沈玄庐说,自己和其他同人创办《星期评论》,“把自己的‘主意和趋向’写出来,‘请天下人看’,同时也‘求天下人批评’”。^[103]换言之,我和天下人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人有阅读的权利,也有批评的权利。办报刊,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但也不是固执己见,把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当真理。《星期评论》积极地批评社会,“批评世界上的事事物物”,同时也热烈欢迎他人批评自己,“批评我们的批评”。^[104]《星期评论》第2号在以本社同人署名发表《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时也指出,这一篇民国建设方针是同人们“几年以来研究”的成果,把它完全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供全国国民的研究,求全国国民的批评”。^[105]

《星期评论》从方法论入手,把科学精神归纳为研究和批判,在研究和批判中,强调科学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强调科学研究要重视概念和分类,重视统计资料,强调学术批判应是“自由批判”,是“批判的自由”和“批判的能力”的完美结合。凡此种都表明,《星期评论》对科学精神的认识不仅有一定的高度,而且有自己的特色。但受刊物同人知识结构的限制,《星期评论》对如何研究和批判的论述主要侧重在社会问题和社会科学领域,这是它的不足,同时也是五四时期众多大众刊物一个共同的缺陷。

三、发展科学的机械工业,构建分工协作的互助社会

对于科学的认识,近代中国人最先感知到的是科学的应用——科学的物质形态。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在战争中的失利实际上是科学应用的落后:“英夷

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良,二者皆非中华之所能。”^[106]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痛感“船坚炮利不如夷”(冯桂芬语)的同时,进一步意识到“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107]意识到西洋之富强在于“有机器”“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之力所仅能者,一人之力能造之。”^[108]而在机器的背后则是科学——“洋人制器出于算学”;^[109]“西洋制造之精,实源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110]此后中国人对科学与富强、现代文明之间联系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严复说:“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荒废,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111]任鸿隽说:“近代国富之增进,由其工业之发达,而工业之起原,无不出于学问”;^[112]“近世实业和旧时实业不同之点,是近世实业多用机械,旧时实业多用人工。因为有机件,所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一部蒸汽机关,可当百千万人的力量。”^[113]孙中山指出:“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114]蔡元培说:“现在世界全由科学支配。”^[115]胡适说:“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116]一言以蔽之,科学造成了机器大工业,造成了现代文明。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等人探讨了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戴季陶认为“‘科学的机械工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117]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机械工业的落后,“中国现代的工业,尚极幼稚,所谓机械工业,差不多没有。”^[118]“中国是一个工业上的后进国,大机器工业还不是很多,工场的最大多数,都是使用百人以下的工人。”^[119]大机器生

产的缺乏和落后,导致中国的手工商品无法在市场上与外国的机器制造品竞争,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经济无法独立和自主。“国际贸易一发达,手工生产国和机器生产国,都占在一样的自由竞争市场上。手工生产国的生产组织,又当然被机器生产国压倒。”^[120]“中国的‘家庭工业’‘手工制造品’,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外国来的‘机器制造品’打灭了。我们日用的东西,几乎离了外国舶来品便不行了。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做了外国的‘工业战利品’,已经失了自己的‘独立权’。”^[121]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等人讨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戴季陶指出,发展大机器生产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条件:“我们中国国民生活受着外国大工业的压迫,如果我们自己不革除旧日的手工业,代以近代的大机器工业,只是购买外国的机器生产品,中国人的生活,是要破产的。”^[122]五四运动期间,不少地方发起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戴季陶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暂用手段,不是经济上的根本原则。这是惩罚日本的行动,不是救济中国的办法。”救济中国经济的根本方法不能靠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这类行动,因为这一行为是建立在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爱国狂热基础上的,是不能持久的,国货“今天靠着大家的‘爱国狂热’是可以畅销,明天这群众的‘爱国狂热’减少了,中国的市场,仍旧要被‘舶来品’占领去的。”拯救中国经济的根本的方法在于“相信科学”,发展科学的机械工业,“兴办各种的大工业”。^[123]戴季陶把当时中国的劳动划分为“商品化的”“非商品化的”“商品化与非商品化之间的”“未到商品化程度的”四种。他说,随着科学的发达和机器工业的振兴,中国必然会出现“劳动的商品化”过程,出现“第二、三、四种的劳动”“渐渐移转向第一种劳动里去”的过程。戴季陶肯定这一过程的进步意义,认为这一过程“从‘现代的政治意义’上说,就是‘法律上的自由人格平等化’”。“文明一天一天进步,科学一天一天发达,机器工业一天一天振兴,资本家的企业

一天一天扩大,于是这政治的德谟克拉西意义上的‘法律上的自由人格平等化’,便一天一天的实现起来,和法兰西流、美利坚流、英吉利流的自由平等社会的现象,一天一天的接近。”^[124]孙中山也非常重视发展中国的机器大工业。他把资本时代化,指出工业文明时代的资本不是金银,而是“助人力以生产之机器也”。在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与机器具有相通性,“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是故资本即机器,机器即资本,名异而实同也。”^[125]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126]因此,中国应该大力“欢迎外资”“欢迎机器”“欢迎此种制造之利器,以发展中国之实业”。他认为,中国“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若能抓住机会,充分“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27]

但是孙中山认为中国不应该因循欧美发达科学、利用机械、振兴实业的老路。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就形成了自己的以节制资本为核心的民生主义思想。他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128]社会分化成贫富两大对立的阶级,“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129]资本家和工人互相对立,彼此争斗,“社会革命其将不远”^[130]。他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131]中国应该积极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以欧美为鉴戒,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132]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星期评论》众多作者的思想认识。李汉俊说,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应该包括“国强民富”两个方面,故不能“不讲究分配而只讲究生产”,“非把分配看得与生产一样重要不可”。^[133]朱执信认为中国不仅存在着一个产业落后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所以中国不能仅考虑如何采用大机器生产以振兴实业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分配问题,考虑如何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如果中国振兴实业

不能做到普惠大众,让更多的人有工做、有饭吃,反而因为大机器的使用导致更多的人失业,那么,使用大机器生产的现代工厂越多,社会上的“土匪流氓就要越加多”。所以中国不能“去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走欧美的老路。^[134]

戴季陶等人把构建分工合作的互助社会看作是合乎科学要求的正义的、合理的发展方针,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戴季陶说:“今日之世界,科学的世界也。……吾人生此科学之世界中,深希望国家之组织成为科学之组织,政治之施設成为科学之施設。……故就政治之方针论,应以真伪判善恶,以善恶定是非,以是非定方针。”^[135]什么才是合乎科学要求的正义的正确的的发展方针?沈仲九说:“科学应用的利益,就在利用自然物的质力,去替代人类的劳力,减少自然的障碍,增进身心的娱乐。”他认为,“西洋人民,因科学发达,受很大的苦痛!但这种苦痛的发生,并不在于科学本身的不好,在于误用科学。”^[136]李汉俊说:“科学既可以给人的享乐,当然应该会给人的享乐。”“工是要大家做的,安乐是要大家享的。”^[137]戴季陶认为:“人是为社会而生存的,生产是为应社会需要的,人才也是为应社会的必要而养成的。社会组织的意义,是在全社会各分子的普遍幸福上,并不是在少数人的特殊幸福上。”所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分工协作的互助社会”。^[138]陶孟和指出:分工协作的互助社会,是最符合科学、人道、进步要求的社会。从科学的角度看,“分工越微细,各人所费的劳力也就是越省……机械的种类越多,也就越省工作……人类发明机械、分配工作的程度,日益进步,人类的劳动,也就日益省时省力。所以劳动缩短时间是自然的倾向。”“人在一定时间内可生产最高量。假使让疲劳的人工作,生产量一定减少。”从人道的角度看,延长劳动时间,把“劳动者变成机械的奴隶”,是“人类的最不幸”。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劳资合作,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人福利,不仅有利于“增进劳动者的幸福”,而且有利于“增进消费者

的利益”，“更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和工人的补习教育问题”。^[139]一句话，分工、协作、互助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五四时期是中国科学思潮勃兴的时代，但同时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柏格森、倭铿等人的生命哲学影响下，反科学思潮也在中国滋生、兴起。在双方的斗争与较量中，《星期评论》高呼“科学万能”“科学万岁”的口号，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科学新文化阵营，成为五四时期科学民主思潮的拥护者和助推者。《星期评论》不仅从理性救国、社会改造、破除迷信、思想启蒙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科学的意义，还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把“研究与批判”确定为科学的精神，这一提法与偏向于目的的追求真理说、偏向于态度的实事求是说并行不悖、互为补充，构成了现代科学精神的三个基本内容。《星期评论》强调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追求真理的态度，真正的学术批判应是“自由批判”，是“批判的自由”和“批判的能力”的统一。五四时期，主张“批判的自由”、要求言论绝对自由的刊物多，强调批评者要有“批判的能力”的刊物少，《星期评论》对批判力的强调，体现了该刊对社会文化问题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辨力。《星期评论》把现代社会界定为“科学发达的机器生产时代”，在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影响下，戴季陶等人在积极主张发展大机器生产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的同时，强调中国应以欧美为鉴戒，通过积极有效的手段，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增进劳动者的幸福”，构建分工合作的互助社会。《星期评论》的这一思想虽然带有不少的主观空想成分，但历史地看，是中国人在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下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 [1][7][14]戴季陶：《潮流发动地点的变动》，《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
- [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3页。
- [3]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

年9月15日。

- [4]玄庐：《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其八），《星期评论》第9号，1919年8月3日。
- [5]仲恺：《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其三），《星期评论》第8号，1919年7月27日。
- [6]仲九：《我的人生观（中）》，《星期评论》第20号，1919年10月19日。
- [7]戴季陶：《爱之真理》，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83-684页。
- [9]季陶：《我和一个朋友的谈话》，《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 [10]I. C.：《日本的“黎明会”和“新人会”》，《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 [11]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 [12]梁启超：《南学会叙》，汤志钧、汤仁译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19页。
- [13]戴季陶：《海外天府论》，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352页。
- [15]菡玉：《女子与共和之关系》，《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4张，1919年10月10日。
- [16]菡玉：《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星期评论》第8号，1919年7月27日。
- [17]溥泉：《敬告学生诸君》，《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 [18][105]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 [19]季陶：《评国际航空法》，《星期评论》第19号，1919年10月12日。
- [20]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 [21][22][27]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么做》，《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 [23]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 [24]汉俊：《强盗阶级的成立》，《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10张，1920年5月1日。
- [25]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7日。
- [26]季陶：《工人教育问题》，《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 [28]季陶：《上海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3张，1920年5月1日。
- [29]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4张，1920年5月1日。
- [30]先进：《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星期评论》第21号，1919年10月26日。

[31][34]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2张,1920年5月1日。

[32]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与将来》,《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33][137]先进:《怎么样进化》,《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35]大白:《思想的监狱》,《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

[36][37]蒋作宾:《战后游历欧美的感想》,《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5张,1920年1月3日。

[38]《伍老先生与鬼》,《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39][136]仲九:《我的人生观》(下),《星期评论》第21号,1919年10月26日。

[40]季龙:《宗教的共和观》,《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4张,1919年10月10日。

[41]季陶:《宗教与信仰》,《星期评论》第19号,1919年10月12日。

[42]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

[43]玄庐:《对于(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怀疑》,《星期评论》第36号,1920年2月8日。

[44]刘大椿:《一般科学哲学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28页。

[45][5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4页。

[46]黄知正:《“五四”科学思潮的双重轨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2期。

[47][52]胡适:《〈科学与人生态〉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54页。

[48]转引自[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83-84页。

[49]严复:《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纪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3-404页。

[50]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2页。

[53][6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5、362页。

[54]菊农:《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1923年6月14日。

[55]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2卷第1号,1916年1月25日。

[56]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上的开幕辞》,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57]陈嘉巽:《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第18

卷第2号,1921年1月25日。

[58]屠孝实讲,甄甫、品青合记:《科学与宗教果然是不两立么?》,《晨报副刊》1922年5月7日。

[59]沫若:《论中德文化书》,《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6月。

[61]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第109页。

[62]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63]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64][77][93][97][98]《研究与批判》,《星期评论》第19号,1919年10月12日。

[65][73]李汉俊:《改造要全部改造》,《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1日。

[66][135]戴季陶:《理势论》,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689、688-689页。

[67][69][70][72]朱执信:《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68]玄庐:《考试与毕业》,《星期评论》第38号,1920年2月22日。

[71][133]李汉俊:《发刊旨趣》,中共湖北省潜江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主编:《李汉俊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367、369页。

[74]云陔:《唯物史观的解释(续纪念号)》,《星期评论》第20号,1919年10月19日。

[75][英]皮尔逊著,季陶译:《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下)》,《星期评论》第7号,1919年7月20日。

[76]玄庐:《中华民国的基础在那里》,《星期评论》第21号,1919年10月26日。

[78][99]季陶:《劳动者解放运动与女子解放运动的交点》,《建设》第2卷第2号,1920年3月1日。

[79]季陶:《“萨波达举”的研究》,《星期评论》第34号第1张,1920年1月25日。

[80]参阅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玄庐:《“人”与“物”》,《星期评论》第12号,1919年8月24日;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81]仲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星期评论》第40号,1920年3月7日。

[82]季陶:《此行珍重》,《星期评论》第23号,1919年11月9日。

[83]李人杰:《男女解放》,《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6张,1920年1月3日。

[84][101]季陶:《蔡先生委曲求全的是非》,《星期评论》第39号第3张,1920年2月29日。

[85]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上)》,《星期评

论》第20号,1919年10月19日。

[86][119][124]季陶:《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上海的劳动条件如何?》,《星期评论》第35号,1920年2月1日。

[87][英]皮尔逊著,季陶译:《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上)》,《星期评论》第5号,1919年7月6日。

[88]季陶:《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星期评论》第15号,1919年9月14日。

[89]李汉俊为其所译的北泽次郎的《I. W. W. 概要》一文所写的序,载于《星期评论》第33号,1920年1月18日。

[90]季陶:《中国现在社会问题的意义》,《星期评论》第13号,1919年8月31日。

[91]季陶:《〈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星期评论》第49号,1920年5月9日。

[92][117]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建设》第1卷第2号,1919年9月1日。

[94]徐苏中为克鲁泡特金《国家论》所写的跋,载于《星期评论》第42号,1920年3月21日。

[95]沈仲九:《我的人生观(下)》,《星期评论》第21号,1919年10月26日。

[96]本社同人:《〈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100]季陶:《介绍两位新朋友——〈民风〉周刊、〈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第15号,1919年9月14日。

[102]汉俊:《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上)》,《星期评论》第51号,1920年5月23日。

[103]玄庐:《发刊词》,《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

[104]《欢迎投稿》,《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

[106][清]包世臣撰,李星校点:《与果勇侯笔谈》,《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芥民四术》,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91页。

[107][清]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鸿章全集》(3),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15页。

[108][清]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丁凤麟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0页。

[109][清]曾国藩:《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摺》,《曾国藩全集》(十),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6093页。

[110][清]李鸿章:《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李鸿章全集》(2),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211页。

[111]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

[112]任鸿隽:《科学与工业》,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0页。

[113]任鸿隽:《科学与实业之关系》,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220页。

[114]孙中山:《孙文学说——知行易》,《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4页。

[115]《蔡鹤庐先生之教育谈》,《神州日报》1916年11月22日。

[116]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118]苏中译:《八时问题之经过》,《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3张,1920年1月3日。

[120]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星期评论》第25号,1919年11月23日。

[121][123]季陶:《国民自给与国民自决》,《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

[122][138]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星期评论》第41号第1张,1920年3月14日。

[125][127]孙文:《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1张,1919年10月10日。

[126]孙中山:《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

[128][130]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289页。

[129]孙中山:《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131]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7-328页。

[132]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3页。

[134]执信:《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星期评论》第37号,1920年2月15日。

[139]陶孟和:《六时时间之劳动》,《星期评论》第52号,1920年5月30日。

[责任编辑:陶婷婷]